

舆地广记

黄县地名之“铺”与“堡”

王东超

我国的驿传制度很早就已比较完善。驿路上，每隔一定距离就要设置邮、亭、驿、置、传舍等设施，以供来往人员休息、更换马匹之用。

秦汉时代是五里一邮、十里一亭、三十里一置，每县至少一个传舍。到了唐代，亭、置、传舍之名已经取消，但是驿的名称仍大量使用。非通途大道设的驿站则称为“馆”。李白《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：“徵乐昌乐馆，开筵列壶觞。”黄县的黄山馆是否为唐时得名呢？“递铺”即驿站。唐无名氏《玉泉子》：“李德裕在中书，尝饮惠山泉，自毘陵至京置递铺。”

宋制邮驿分离，设送往迎来、接待官员的驿馆之外，别设传递官府文书的急

递铺。《宋史》：“凡奉使之官赴阙，视其职治给马如格。官文书则量其迟速，以赴步、马、急递。”

元代急递铺兴盛。《元史》：“古者置邮而传命，示速也。元制，设急递铺，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。”“每十里或十五里、二十五里，则设一铺。”

明代沿用此制。《西游记》第二回中，孙悟空学会了筋斗云：“大众听说，一个个嘻嘻笑道：‘悟空造化！若会这个法儿，与人家当铺兵，送文书，递报单，不管那里都寻了饭吃！’”第三十五回：“行者笑道：‘诚然劳苦，你们还只是吊着受疼，我老孙再不曾住脚，比急递铺的铺兵还甚，反复里外，奔波无已。’”

黄县现存的四本志书中均有“铺”的记载。

康熙版《黄县志·建置·墩铺》：“总铺旧在西关内，其关外为杨官铺，十里铺西十里，南栾铺西二十里，北马铺西三十里，官庄铺西四十里，界首铺西五十里，黄山馆铺西六十里；南王铺东北十里，作羊铺东北二十里（俗名诸由铺）。”

乾隆版《黄县志·建置·墩铺》：“总铺旧在西关内，其关外为杨官铺，十里铺西十里，南栾铺西二十里，北马铺西三十里，官庄铺西四十里，界首铺西五十里，黄山馆铺西六十里；南王铺东

北十里，作羊铺东北二十里（俗名诸由铺）。”

同治版《黄县志·营建志·墩铺》：“城中有总递铺，西关外为杨官铺，西十里为九里店铺，又西十里为南栾铺，又西十里为北马铺，又西十里为官庄铺，又西十里为界首铺，又西十里为黄山馆铺。县东北十里为南王铺，又东北十里为柞杨铺（俗名诸由铺）。”

《光绪增修登州府志·驿传》：“急递铺，总铺在城中，司兵三十六名，抵招远曰杨官、曰九里店、曰南栾、曰白马、曰官庄、曰界首、曰黄山馆，抵蓬莱曰南王、曰柞杨。”

南王村，在蓬莱县城东南，明正德年间，其一支迁至黄县建村，村名一仍其旧，即今徐福街道南王村。不过徐福街道的南王村位于黄县城西北，并不在驿道上，所以不可能是南王铺。

“南栾铺”何时改为“南栾堡”？

“大堡”旧志虽未见记载，但旧志都是写作“铺”的，故当初也应写作“大铺”。民国县志成书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“铺”改“堡”应是这之后的事。至于为何要把“铺”改为“堡”，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：一是地名的“铺”字容易与裁缝铺、木匠铺、铁匠铺、药匠铺、成衣铺等商铺的“铺”字相混。二是铺舍是府县交通要道上的节点，各铺舍除了传递公文外，还兼有旅店住宿、哨所警报等功能，时日一久，往往能促进

清沿明制，但驿站名称分得更细：各省腹地称驿，专为军报而设称站（蒙古语“站赤”的简称，现代说的车站之“站”即来源于此），嘉峪关外叫塘（“塘”“汛”为明清时驻军警备的两种大小不同的关卡。“塘报”即通过这些关卡传递的军事情报。浙东一带赛会时，由一个化装的孩子骑马先行，预示赛会队伍即将到来，称“塘报”。鲁迅《朝花夕拾·五猖会》：“然而记得有一回，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。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，称为‘塘报’；过了许久，‘高照’到了。”），西北地区称台（最著名的当数新疆塔尔哈巴台、清代外蒙乌里雅苏台）。递运货物者称所（递运所），传递公文者称铺（急递铺）。

民国《黄县志·建置·墩铺》：“铺递之设，年代无考。旧志载，城中有递铺，西关外为杨官铺，西十里为九里店铺，又西十里为南栾铺，又西十里为北马铺，又西十里为官庄铺，又西十里为界首铺，又西十里为黄山馆铺。城东北十里为南王铺，又东北十里为柞杨铺，一名诸由铺。都凡八十里，现已废置。”急递铺主要传递官府文书，所以大多位于府州县之间相连的道路上。

急递铺废置后，有些铺舍把地名中的“铺”去掉，有的仍然保留，这就是“铺入地名”现象。

铺舍周边的商贸活动，吸引人口前来聚集、落户，形成聚落、村落。急递铺所傍村落多地处要道，往往规模较大，情报通达，一旦遇到战乱、匪患、社会动荡等特殊情况下，这些村落的军事防御价值就一下子凸显出来了，比如在四周建起土制围墙等设施。如此一来，这些分布在急递铺附近的村落在功能、形制上几乎与堡垒无异了，慢慢也就用“堡”取代“铺”了，读音也读作pù。

“堡”读作bǎo时，指小城。“堡”读作bù时，指堡子。《柳堡的故事》是当年知名的一部电影，“堡”读作bǎo；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会议，上学时老师把“堡”都读作bǎo，正确的读法是bù。所以遇到带堡的地名要注意区分：南方多读作bǎo；西北多读作bù；驿道旁边的多读作pù。

烟台故事

被误读的苏公祠

蔡玉臻

北宋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，苏轼赴任登州知州。他在登州任职仅五日，便奉诏还朝。尽管如此，他连上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两疏，为登州百姓争取到了海防建设与免除盐税之利。登州人感念其德政，自此便有了“五日知州，千秋传颂”之誉。

后世流传中，这句话逐渐演变为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苏公祠”。这一说法屡见于碑刻、楹联、导游词与通俗文史作品之中，但其中涉及的历史细节，与宋代的实际建制和祠宇沿革多有出入，是不妥的。

先说这“五日登州府”。苏东坡任职时期登州仅是州不是府，他的职务也只说成知州。另外，登州是明代升州为府的，之后存在了近六百年。因为登州府是个行政机构的名称，并不是一个官职，登州府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作知府，不能称作“登州府”。

宋朝登州是州不是府

宋代的地方行政区划中，登州一直为州级建制。自唐武德四年（621年）置州以来，经唐、宋、金、元各代，登州始终称“州”，而非“府”。北宋至道三年（997年），登州隶属京东路；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改隶京东东路，治所在蓬莱，下领蓬莱、黄县、牟平、文登四县，为防御州。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《太平寰宇记》等文献均记载为“登州”，未见“府”称。

“府”作为高于州的行政区划，始于唐代，至宋代仅设于京师、陪都及重要地区。登州终宋一代，未曾升府。直至明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，为加强海防，登州才由州升为府，隶属山东布政使司，辖宁海州及蓬莱、黄县、栖霞、福山、招远、莱阳、文登七县，“登州府”的建制由此开始。

苏轼于北宋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任登州知州，其时距离登州升府尚有二百九十一年。以“登州府”称之，是将明代以后的建制搬到了宋代。

苏轼的官职是知州不是知府

宋代州级长官的正式官称为“知某州军州事”，简称知州。这一官职掌一州之兵民、刑政与财赋，通常由文臣充任。苏轼在《登州谢上表》和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中自署“朝奉郎、知登州军州事”，

这是其正式差遣。

“知府”一职，始于明代，是府级长官的正式称谓。宋代并无“知府”之官称，更不存在“登州知府”的说法。后世以“知府”称呼苏轼，是把明、清两代的官名前移到了宋代。

简而言之：宋代称州，长官称知州；明代称府，长官称知府。苏轼是知州，不是知府。

苏公祠始建于明代不是宋代

苏轼在登州的德政虽早被百姓铭记，但专门祭祀他的苏公祠并非建于宋代，而是晚至明代末年才出现。

北宋时期，登州已有祭祀苏轼的场所，但仅为配祀而非专祠。元符元年（1098年），登州知州张万宪修建三贤祠，同时供奉马默、李师中、苏轼三人，苏轼为从祀者之一。这三座三贤祠历经金、元两代，屡有兴废，其位置也并非今天蓬莱阁上的苏公祠。

今日蓬莱阁建筑群的苏公祠，始建于明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，原址在蓬莱阁前。清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迁建于现址。另据记载，明万历十七年（1589年）曾增建相关建筑，皆属明代中后期，与北宋并无直接承继关系。从苏轼莅任（1085年）到苏公祠始建（1638年），中间相隔五百五十三年；从三贤祠建立（1098年）到苏公祠始建，也相距五百四十年。

“千年”之说并非实指

“千年苏公祠”中的“千年”，其实是一种文学化的夸张。以苏轼登州任职的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算起，至今不足千年；以苏公祠始建的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算起，至今不到四百年；以苏轼本人的生卒年（1037—1101）算起，同样不足千年。若将“千秋传颂”的赞美之辞，误作祠宇历史的真实纪年，会形成年代上的偏差。

苏轼在登州虽只留任五日，却以两疏惠泽一方，其德政为登州百姓世代传诵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流传的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苏公祠”一语，虽饱含敬仰之情，但在建制、官称、祠史、纪年等方面与史实有所偏离。

今人谈及苏轼与登州的这段佳话，不妨保留那份敬意，同时厘清宋明制度之别、州府之别、知州与知府之别、专祠与配祀之别。唯有史实清楚，敬意方能长久流传。